

总 序

设计是人类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活动,是一项提高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和美化生存环境的重要活动。人类所生产的产品和使用的工具、人类居住的建筑和城市,都是经过人们有意识设计的产物。而我们现代生活的周围环境等等,也和设计有极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设计的发展和人类文化水平及生活意义是分不开的。现代工业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设计及实践的发展,显示了设计在人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人类社会工业化发展、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等领域中,设计是一名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在如何把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方面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集技术学与艺术学于一体的重要学科,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人认为,21世纪是一个依靠设计的世纪,设计将在未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是有一定道理的。设计既是一门技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科学,把科学技术与艺术美学更好地结合起来,创造一个科学与人文、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人类生存环境,应该是当代和未来设计学科致力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正处于科学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的时期,设计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面对新的世纪和人类生活方式正在发

生的深刻而巨大的变革,这既给中国设计界以挑战,也给中国设计界以机遇。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优秀的人文传统,它高度重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当代中国的设计应既借鉴西方设计历史上的经验,又立足于自身的发展来探索中国的设计问题,把科学技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走综合发展的道路。

设计是重要的,设计科学的研究和探索也是重要的。我很高兴看到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赵萌和李建盛主编的《设计·21世纪生活风格》丛书把设计放在一个多学科的视野中,结合现代设计的实践,对设计做出理论性的探讨,我想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国内设计界更多的人来关注中国的设计问题,使这世纪的文化更提高、使人类的生活更富有意义。

李收道

《设计·21 世纪生活风格》丛书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名誉主编 李政道

主 编 赵 萌 李建盛

编 委 朱红文 孙 津 杭 间 邹 文

包 林 赵 萌 李建盛 张 森

策 划 李学峰

目录

一、导言：国家与形象	1
1. 个人与国家	2
2. 形象的类型参照	5
3. 现代化与全球化	9
4. 国家形象设计	13
二、追求现代	16
1. 统一标准下的传统问题	16
2. 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18
3. 穷就不现代	21
4. 现代是保守的	24
三、共识与矛盾	27
1. 对国家的共识	28
2. 共同体的矛盾	31
3. 观念的冲突	34
四、整体行为	39
1. 发展的文化根基	40
2. 安全的实力和策略	45
3. 制定和创设规则	50
五、文化机制	55
1. 中心与外围	56
2. 收敛与发散	61
六、以国家的名义	67
1. 理由与利益	68

2. 社会的国家意义 72

七、设计的自觉性 80

1. 理念的选择 81
2. 进步与改造 87
3. 指标体系 91

八、在边线上 96

1. 模式的极致 97
2. 广告化 101
3. 国家边线的挑战 103

九、变化的国家形象 109

1. 无国家、反国家和超国家 110
2. 缩小与扩大 115
3. 创新的不确定性 118

十、赛局中的竞争 124

1. 适应与调整 125
2. 谁是赢家? 130

导言：国家 与形象

谁都知道当今世界是一个激烈竞争的角逐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是如此。不过,无论怎样讲全球化、讲国际合作,世界上最基本的、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共同体仍是民族国家,因此,参与竞争并从中获利的基本单元还是国家。能否在竞争中获利,取决于对各种优势地位的占有和保持,在诸种优势中,国家形象是极为重要、非常普遍的一种优势。然而,也许正为人们对国家形象的体认太直接、太经常了,以至于在理论上都没有引起重视。比如,人们在对外交往中,可能知道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而坚持一些原则,但是,如果问有没有一种利益可以算做国家利益、什么因素构成了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有什么功能、甚至国家形象是如何变化的等等,恐怕多数人都难以回答,甚至根本没考虑过。

形象这个词的确很难准确确定,一般说来,它是从文

艺学借来的一个概念,指可以引起人的思考和情感的某种状态。当我们说国家形象的时候,指的是能体现国家性质、构成、制度、功能、实力以及文化的各种特征。从接受一方来讲,这些特征是对某个国家整体行为及观念态度的看法,但从国家自身来讲,却是一种自觉设计的结果。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不可能是无理性的盲目行为,同样,哪个国家都不愿意接受不好的形象评价(比如贫穷、落后、野蛮、法西斯等等)。因此,国家形象还具有道德为善的价值取向,是要努力争取才能赢得的。不仅如此,赢得国家形象往往也就是在一些主要领域争得优势,因为形象不光是一种脸面,更重要的它就是国家整体行为的体现,并且标识和增值着国家整体行为的能力。

1. 个人与国家

出门在外,尤其是到了异国他乡,不相识的人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会以“你从哪儿来”这句话开始他们的交谈。这可不是一般的寒暄客套,无论交谈的各方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在验明自己和对方的某种身份。这种验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但其意义却在于一种归属感,一种从属于国家形象的特征区别。在这方面,我就有过一次不无极端的体验。那是1990年,当一个美国农民听说我从中国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一片迟疑。显然,在他的知识库中找不到适合我的位置归属。想了一会儿,他才不很肯定地问我是否就是来自有着“西藏”(Tibet)这块地方的国家。

我不怀疑这个农民的智商,但我当时却一下子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充满了厌恶。我不能肯定这个农民对西藏

了解多少,但我可以肯定他所得到的有关信息一定充满了歪曲和误解。显然,当他用“西藏”作为验明我身份的参照时,我所归属的国家形象在他看来无非就是贫穷、落后、野蛮,尽管西藏的情况并不如此。

不过,类似的情况并不都出于歪曲或误解,尽管可能有些夸张。电影《王中王》里有一句台词说,在法国人眼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反正没有什么区别。说这句话的法国人其实是把这两个国家都看成了侵略好战的军国主义化身。同样,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葛罗米柯对美国人说,你们不是认为共产国家的代表难对付吗?那你们就等着见周恩来吧!不管葛罗米柯当时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种国家形象上的优胜心态却是溢于言表的。

从个人交往的角度来说国家形象,只是为了便于从经验上理解国家形象的重要性。比如海外华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中国强大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他们在海外也就更有尊严了。但是,国家自身就是一个共同体,其形象既是整体的,也在制度、组织、行为、理念、文化、道德、甚至产品、体育比赛等几乎所有事情中体现出来。因此,国家形象并不仅仅是一种标志性特征,而且还是一种功能性的行为。就具体的特征和行为来讲,它们可能体现了国家形象的不同方面,然而整体说来,至少在我们这个还由各个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国家形象就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的真实位置。

我们当然可以具体地表述一个国家的形象,事实上,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更真实的情况还是有意识地),每个国家都是以某种形象区别于其他国家。一个国家的实际行为能力,同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形象体认是互为因果的。换句话说,国家形象既是由其国内的行为自觉形成的,也是由它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来确定的。

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即是对国家之间在文明和文化上的异同负责。事实上,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和大众传媒到处渗透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误解并不多,有的只是故意歪曲。然而,歪曲本身也是一个国家形象形成的因素,它表明这个国家(或者说它的掌权者)想让其国民如何看待某些别的国家。于是,对话和沟通成为必要,但是对话和沟通的指向并不一样,这不仅是各国所要求的目的不同,而且一国内政党、政府、国民各自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一个国家到底以什么形象树立在这个世界上,其因素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既有一国对自己形象的设计,同时也在于它被其他国家的再设计。

然而,和工程师设计一幢大楼或一台机器不同,国家形象的设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总是从本国利益出发来制定政策,并且免不了许多试错式的修改,因为理想的状况毕竟很难达到,甚至什么是未来的理想也往往是不清楚的。列宁历来被认为是天才是务实理论家,所以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也就是1921年,他宣布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在苏维埃体制中重新导入市场经济,虽然用列宁的话来讲,这种做法是从“战时经济”暂时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去世过早,人们没有能够看到列宁要用新经济政策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苏联,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前途的。除了政府对经济的高度计划之外,新经济政策之所以短命的原因在于一种先天的不足,即苏联当时是一个以小农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而80%以上的农民无论怎样进入市场经济,也无法支撑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投入和消费。

对国家形象最缺乏设计,但却用最短的时间形成了最具特征的国家形象的例子,可能要算古巴的革命了。卡斯特罗显然是一位具有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克里斯

玛”气质的领袖,而且他的这一天才从不到30岁起开始突显,直到今天仍风采不减。但是,古巴革命的成功实在是因为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政权过于腐败虚弱。卡斯特罗后来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因为他和古巴共产党相互需要,因为共产党可以为他提供治国的组织,而他却给共产党以存在的合法性。另一个原因是苏美争霸所造成的国际势力范围。古巴革命成功时,美国搞不清楚卡斯特罗想干什么,但是由于他和共产党关系冷淡,美国才没有把古巴作为共产国家来打击,而在1954年,当危地马拉出现改革派政府时,美国轻易就颠覆了它。等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现古巴成为共产国家时,再想干涉已为时过晚。1961年猪湾(the Bay of Pigs)进攻的失败当然是美国在军事上的失误,因为中央情报局只是策动一小股古巴流亡人士去打仗,而这些乌合之众既无战斗力,也得不到古巴人民的支持。不过,美国就此罢手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认输,而在于冷战格局中美苏两国都心照不宣地不去侵占对方的地盘——而此时古巴已明显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中选择了自己的位置。稍后发生的导弹危机之所以有惊无险,道理也在这个地方,只是这一次美国占了便宜,它表面上也作了让步,但它从欧洲撤走的那些导弹,原本就是超期服役的过时货。

2. 形象的类型参照

只要国家存在,国家间的异同往往就构成着国家形象。个人的行为举止当然会反映出国家形象的风貌特征,所以国家也就对个人有各种规范和约束,以便与所要树立的国家形象相一致,从国家元首到普通百姓都是如

此。但是,一国的形象往往是由国际上对它的关注决定的。比如,中国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就因为这个地方作为特区对别国的开放程度最高,各种试验也最能表现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同样,国际关注的问题也能不顾某国的意愿而成为该国形象的某个突出特征。比如,不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也不管它们对中国的情况是存有误解还是别有用心,总之它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和指责(当然也有赞扬的言论,不过这种言论不仅不多,而且不代表官方),表明人权问题在这些国家看来已经成了中国国家形象一个重要的构成特征。

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形象形成的时候,不仅不一定符合该国的自觉设计,而且国际上也可能看不出这种形象的成因以及真实含义是什么。1979年到1982年间,伊朗、叙利亚、甚至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一系列革命和动乱,对于这些变故,人们可以看到的是宗教导师的重要作用以及群众力量的再度复兴,但是,人们却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自觉的目标设计,更谈不上对旧社会的改造。就伊朗来看,惟一清楚的情况,是宗教性原教旨主义成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就参与革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工匠、市民来说,《古兰经》并不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也是在这一段时期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革命都自称或被看成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比如贝宁、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安哥拉,甚至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然而事实上这些革命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同于中国的革命战争,问题只在于:它们有它们要解决的麻烦,但是连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看待这些行动的意义。

无论自觉与否,也不管本国还是国际,国家形象的确总是在某种归类中得到明确的。这种归类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的 30 年中最为清楚,当然也最为简单省事: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冷战结束之后,归类就困难多了。苏联不存在了,中国在不断深化改革,于是社会主义这一大类的界线特征变的模糊不清了。其实资本主义这一类型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人们都喜欢把冷战结束看成一件好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只在于国家形象有了远比冷战时期要多的塑型可能或机会,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两个超级大国以及次一级的诸多大国都已经不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证明自己比别的国家更优越,换句话说,“竞争”中不再有赢家了。事实上,冷战结束是由于苏联先输了,而它的解体掩盖了资本主义的颓势。20 世纪 80 年代似乎是一个转折,英国最后一次坚定地尝试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结果每况愈下。然而西方偏偏不负责任,还是把这种不再奏效的体制推荐给苏联,而解体后的各前社会主义国家却也很乐意地将此当成救治良方,甚至誉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ies)。直到 21 世纪,世人才越来越认识到,其实各国都在实行或尝试程度和方式不同的“混合经济体制”(Composite economy),只不过各国都没有什么成功的办法——除了中国。中国不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将此作为自己的“特色”。这样,中国反而独树一帜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当然它能否成为其他国家形象的归类参照现在还很难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因为它就表明了历来相矛盾的两种体制的合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际上最为迷惑不解的,或者说中国国家形象最模糊不清的地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也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反而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时候,中国的国家形象才逐渐清楚起来:人们之所以会迷惑

不解,是因为原来的归类参照(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讲都套不上。其实,这种既定标准失范的情况表明,世界上已经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了。从勃列日涅夫开始,苏联就明智地使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这个术语,以使列宁所总结出来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致于在理论上失效。苏联的解体,一方面使自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各国更加暴露它们的缺陷,另一方面则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型形象。

事实上,所有西方国家都没有预料到苏联的解体,只是当这个解体发生之后,西方才自以为得计地欢呼资本主义的胜利。然而这种欢呼很快就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相反,由于没有了冷战意识形态,尤其是没有了在经济发展方面不如自己的一个对手,西方的自我夸耀和自我安慰都没有意义了。这就使西方冷静下来考虑自己的麻烦了。从理论上讲,西方所谓的混合经济主要就是指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的结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Slump)的时候,瑞士的国民生产总额之所以低落,而瑞典的却在增高,就因为瑞士没有像瑞典那样由政府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广泛的干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缺陷已不同于30年代,不仅凯恩斯提出的全面就业的理论失灵,而且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哈耶克所竭力主张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再有效了。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根本病症,出现了结构性恶化。熊彼得说,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循环表明,它的病不像扁桃体那样可以切除,而是像心跳一样,是机体的本质出了毛病。这个结构性毛病的典型症兆,就是高失业率,以及政府和社会福利开支的巨大压力。结构性失业至少由于科技的进步而继续扩大,人工成本于是越来越昂贵,而政府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超出了国内生产总额的1/3。到了20

世纪末,英国和瑞典的情况分别代表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的失效。大量失业、非生产性开支激增、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混乱和不稳定又都统统出现了,虽然这些还不能说就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其实应该说“原资本主义”)国家的形象特征。

比较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走着自己的路。西方的混合经济是一个体制中不同功能成分的混合,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却涉及到政治制度的变化。苏联解体 10 年之后,独联体的各个国家逐渐稳住了它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在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也开始正常起来。尽管这些不同的改革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仍不很明确,然而还是有一些国家(比如古巴、越南)选择了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示范了一种国家形象的类型参考。

3. 现代化与全球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家形象在边线区别上的模糊是由世界范围的改革造成的,然而改革的出现却不是哪一个国家突发奇想搞起来的。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改革,而世界范围的改革主要是因为两个改变了世界的运动,即现代化和全球化。对于国家形象来讲,现代化给出了贫富的类型参照,而全球化则造成了边线的游移不定。

把现代化称为“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各国都卷入了现代化竞争,而且很自觉自愿,很争先恐后。从源头看,率先现代化的国家可以说它们 200 年、甚至 300 年前就开始现代化进程了,然而就现代化作为一个现实的

运动来讲,其实只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情。那时候,发达国家对日本连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感到吃惊,于是跑到日本的箱根开会,想弄个明白。结果,学者们把问题集中到现代化上面来,即是讨论各国的发展是否会有相似的模式,以及发达的西方国家是否会成为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方向。但是,真正使现代化成为世界范围的一种运动的,是殖民体系的崩溃。20世纪60年代以后,独立了的国家纷纷想尽快发展,于是世界呈现出一幅穷国追赶富国的景象——这才是现代化的本义。对于富国来讲,一方面由于政治格局的改变和经济的一体化,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再让穷国停留在很低的发展水平;然而另一方面,同样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又不想让穷国追赶上来。这是富国讲“合作与发展”的真实情况和行为底线。

穷国追赶富国,这就是现代化运动,而穷富的程度,或者说穷富系列中的排序位置,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最根本的国家形象。这当然是极为简约化的说法,不过在当今的大众传媒时代,人们喜欢这种明白快捷、非此即彼的简约表述。

现在,让我们用同样简约化的方式来谈全球化“运动”。这个问题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因为穷国要致富,至少从经济上讲,它们必须尽快加入富国的市场竞争。不过,对于穷国来讲,“合作与发展”是相互区分的:发展是穷国的愿望,而合作则是穷国对富国的要求,即尽可能地援助穷国。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道理,而是穷国在现代化追赶中的实绩。但是,正是由于现代化水平的不同,全球化在真正的技术层面只是富国的事,或者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事情,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是程度不同地卷入到发达国家的所谓全球化中来,或者说程度不同地受到这种全球化的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信息产业、知识经济、跨国公司等等,这些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确实又在造成某种全球化的趋向。可以明确指出的因素至少有技术、金融和观念。除了诸如交通、通讯等直接的物质手段,技术还可以包括某种“机制”,比如跨国公司的运作。至于金融,应该说1971年美元与黄金固定兑换比价的取消,就是一种全球化的做法,欧元的启用,只不过使欧洲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更彻底了。所谓观念,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就是各种成功的例子使得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认为,只要它们愿意,就一定能致富。

有了这三个因素,全球化本身不仅成为一场运动,而且是一个有层次的过程,不同现代化水平的国家都可以在某个层次上显出自己的位置。对此我们可以指出某些指标,但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必然会实现所有这些指标。因此,各国在全球化运动中的国家形象就可能出现边线游移不定的情况。下面几个指标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占来就有,然而在全球化运动中,由于地理的扩展和相互影响程度的加强,使得各国的国内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当然,技术手段的改进也使国际贸易有了质的变化,比如劳务贸易国际化、在其他国家进行远距离生产、就地消费等等。其次是资本的流动。全球化依靠网络推动了短期投资,加速了资本的流动。这一情况的重要意义在于,各国政府在税务上的监控能力下降,而交易所对利率和预算反而能做出更敏感的反应,尤其是各种投机活动,更是成为自成一格的“符号经济”。第三是跨国公司。在这方面,民族国家的边线对经济活动的制约大大减缓,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尽量雇用发展中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国家形象因此而产生的模糊不定极为复杂,我们以后将专门分析。最后是从发展中国家涌现的“新兴工业国家”,这是全球化运